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文化入侵的原因探析

许琛琛

(湖南大学法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在经济迅速发展、信息快速传播的当今社会, 各种形式的文化形态相互交融互通, 方便了文化的交流往来。然而,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存在着巨大差异, 由此决定了文化地位的不平等。一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靠着本国的经济实力和科研水平的领先, 进而掌握着文化的输出水平的领先, 把自己的思想文化通过媒体、文化产品、跨国公司或者经济制裁的方式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目的在于影响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 从而最大程度的服务于本国发展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 国际社会看着中国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富强, 朝着既定目标坚定前行, 反华势力愈加紧文化领域的入侵与渗透, 究其背后的原因, 既有意识形态差异的使然, 更是国家利益斗争的结果。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 步入现代化社会的途径也不经相同, 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 还表现为社会制度的迥然不同, 这就使得以美国为首等西方国家将反华排华作为一贯政策。既知原因, 方能对症下药; 在了解西方国家及国际反华势力的企图之后, 才能有所防范, 将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深入推进向前。

关键词: 文化输出、意识形态、资产阶级价值观、国家利益、实用主义外交哲学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一、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

二战结束以来, 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 发展更加迅速, 同时也加紧对他国意识形态侵入的步伐。究其原因, 主要是苏联成为了首个社会主义国家, 其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马列主义对西方国家构成了极大威胁, 成为了西方国家心腹大患。苏东剧变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直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 其中主要以中国为首, 归根结底还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尖锐对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共的政治因素。

(一)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相容

首先,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信念上有很大的差异, 这就直接造成了两个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是一个历史过程, 不仅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 而且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两个阶级政治信念之间的不同而产生对立和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 资本家的资本积累是通过残酷无情地剥削劳动工人的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自由价值观宣称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 是虚假的、不可靠的。资本主义更多体现的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 强调的是资本家个人的私利。资产阶级的政治信念就是资本, 通过一切手段获得资本, 少数的资本家以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为前提, 发展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信仰共产主义,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立足点是全体人民, 而不是少数利益团体; 实质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而不是为了私利; 目标是朝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是具有远大生命力的。其次, 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 本身视为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挑战, 资本主义国家不容许除资本主义之外

其他意识形态国家的存在。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力争夺势力范围,由此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而在社会主义世界,苏联也迅速崛起,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此时的社会主义就像是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到资本主义体内,并以其独有的活力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引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大的惶恐与不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像洪水猛兽般的难以抵挡并将会严重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地位。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宣扬共产主义侵略的思想,恶意夸大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企图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西方国家看来,仍然是布尔什维克一贯的意识形态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和再现,苏联改革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强化其国家力量从而增强其全球战略霸权的竞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在戈尔巴乔夫主导下的改革进程中,看到了颠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机会。实际上,冷战从一开始就被美国从心理上塑造成为“自由”与“专制”的斗争,是为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注重从社会思想、精神和心理领域发起反击共产主义,现在分析看来这是一场有组织、有组织的政治战。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张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¹

1989年,布什宣布就任美国总统。在他上任之后,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对抗苏联,提出“超越遏制战略”,目的即是为了更快的粉碎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以“苏联的变化”为主题,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集中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抗,利用经济、外交等途径,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经济结构,妄图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化、瓦解,实现制度的更换。以思想进攻为主的超越遏制战略有三个具体的实施步骤:1、支持苏联自由化改革,思想多元化、政治自由化、经济私有化;2、鼓励东欧国家内部动乱,脱离苏联的影响和控制,培养亲美势力;3、支持“公开化”,通过戈尔巴乔夫的相关言论,破坏各加盟苏联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迫使国家内部进行民族独立和分裂,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不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并未开展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而凭借着“和平演变”战略实现了其粉碎苏维埃政权的目的。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赞同内因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而外在和平演变战略是辅助原因,但是西方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是一贯政策,就像俄罗斯政治学者季诺维也夫指出的那样:“在苏联危机的成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部原因(尽管不仅仅是这些原因);但是在危机的展开和随后的国家崩溃中,起决定作用的当属外部原因。在与优势的外部敌人的残酷斗争中,苏联和俄罗斯被摧毁了。这个敌人的名字就是:西方。”²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阶级的长久存在,导致了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将是长期存在的。“和平演变”战略将继续成为西方国家的有效武器,在反战情绪普遍高涨的当今世界,此战略无疑能在节省成本的同时达到相应的成效。西方国家反对共产主义不仅是出

于现实政治权力的需要，更是一种维护自由开放意识形态的使命。因此，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存在，那么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行为就不会消失。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警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侵略，坚持“四个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这是我国开展各项建设的强大保证，只有内部足够强大，才能从根本上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二）资本主义内部的衰落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遭受到包括经济和政治在内的整体性危机，表现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民众的怀疑，福利措施的力不从心，政党左派势力的增强。反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却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同时伴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这些都导致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美国彭博社 2017 年发表一篇题为“厌倦资本主义？美国千禧一代已经做好准备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关于是否放弃资本主义制度的讨论引发民众的感慨，并纷纷发表见解。该文还称，调查显示美国的年轻一代更倾向于社会主义。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曾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作出一系列自我改良，赢得了一段时期的稳定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是，这种调整更多停留在分配层面，如增加福利，有一条底线不可逾越，就是不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个底线也成为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社会主义之所以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相反社会上层却加紧财富收敛脚步，导致下层民众生活日益困苦，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也反映了这部分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内心失落的真实写照。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稳定，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比较高，并且拉锯的时间越来越短，破坏力越来越强，恢复的时间也在增加。2008 年这场由美国掀起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显示出比以往金融危机更大的杀伤力，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萌芽、兴起、发展、成熟以及相对稳定时期，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发展程度也在不断地加深。因此，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了世界资本主义致命一击。危机爆发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的实质，因而在危机期间广受推崇。西方学术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通过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寄希望于找到解决金融危机的措施。虽然西方很多学者从信用制度、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出发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但是这只能说是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一个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经济危机就会如影随形。只要社会生产还在持续发展，资本家手中财富积聚的数额就会不断加大，贫富差距也会逐渐拉大。当时的贫富悬殊有多严重？以美国为例，根据当时的人口统计资料：大约有 5000 万人没有医疗保险，462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等家庭的收入在 2010 年退回到 1996 年的水平；男性工人的实际中等工资退回到了 1976 年的水平；最富有的 20% 的人拥有 50% 的工资收入，而底部的 40% 的人则只拥有工资收入 20%；美国顶尖的 400 个富豪控制的财富，比大多数美国人加在一起还多。³ 扩大的贫富差距不仅为

年轻的一代所诟病，更威胁着西方社会上层的发展，震撼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其次，经济上的危机带来政治上的动荡，由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失望，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加强了联系，更有组织、更有规模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坛上发挥着作用。各社会主义政党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实现更好的发展。其调整的方面有：强调斗争的灵活性，不再拘泥于议会内斗争，重视将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的结合；鼓励开展联合行动，努力实现全球反资本主义力量大团结；保持党的独立性。总之，目前的世界形势仍然是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各政党也在形成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政党联盟，一些国家共产党在这种情势下更加注重对外交往与合作，通过举行多边会晤和召开国际会议等形式，共同探讨新时期共产党发展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和传媒的迅速发展，共产党的各项能力在不断提升，其宣传方式、活动方式也在不断进步，有利于日益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

二、价值观差异

价值观是建立在人的思维感官基础上的思维取向，包括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等思维过程，从而体现出事物的一定价值或作用。每个人由于认识事物的角度、方式不同，价值观也会有所差异。在阶级社会中，价值观被深深打上阶级的烙印，价值观具有阶级性、历史性、主观性及稳定性。从全球化大趋势看，越是随着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和频繁，各民族社会的价值观就越会提升其开放性、包容性和普遍性，并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上生长出个性和特殊性。价值观是人们长期生活实践的产物，来源于实践又能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既属于每个人自己而又为他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属于他们的文化的核心内容，并直接基于在文化中具有定向意义的人文文化，也就是基于他们文化中的价值与文明的因素。实际上，价值观无所谓对错，哲学上价值观的内涵就是对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否认别国的思想文化，宣扬所谓的“全球价值观”，企图将意识形态统一于资本主义体系内。

（一）不同的宗教文化圈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到“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⁴ 亨廷顿将世界文明分为包括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八种文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由对民族和国家的小范围认同逐步转变为对更大范围的文明的认同，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也从开始的按意识形态变成按照文明间的关联重新组织。西方文明的影响力不断减弱，而亚洲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却在不断增强。

西方社会经历了 15-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宣扬人可以不通过教会直接同上帝对话，其进一步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力，使基督教文化广泛存于世界各国文化之中。宗教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有着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而基督教是影响范围最广的宗教，至今为止主要发达国家，除了日本，都是基督教文化主导的国家。但是基督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大规模传入中国，近年来虽然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但是远不及本土宗教——道教、佛教的影响力。道教发源于中国，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道家思想是道教形成的基础，

道家思想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其提倡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佛教最初起源于印度，却在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其教义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因果理论方面的；二是关于生命和宇宙真相方面的。这两种宗教文化思想更符合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特点，因此能在中国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反观西方社会的宗教文化，以信奉上帝、信仰《圣经》为核心，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本就不相符合。再者，自古以来上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便无存在感，中国人从来不相信所谓的上帝造人。基督教宣扬的信仰上帝、尊崇上帝、爱上帝的教义无法真正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接轨。而《圣经》大规模传入中国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因此基督教文化在中国难以真正融入百姓生活之中，这也无可厚非。文化各有千秋，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而西方社会以是否信奉基督教来划分国家的好坏、种族的优劣，以此来作为反华的借口，实在是不得民心。

基督教文化的广泛传播是时代发展下的必然。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存在的一种文化与政治两极分化并且达到了极端，一方面是东方的一些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僵化，拒绝同外界交流，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另一方面是海洋的另一端却思想更加开放，探索自然科学的同时已经开展了工业的变革。西方人的海外殖民政策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不仅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将自身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不断强大的西方国家内心得到了极大的膨胀，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是西方社会话语权的后盾。欧美人把种族优越感高高举起并大肆宣扬，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服务于现实，让现实的其他种族都“相信”白种人是最优秀的种族。他们还认为是白种人创造了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就是世界文化，就是地球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就天经地义的悲陋并低人一等。这种借助资本原始积累取得经济、政治上的优势，继而缔造白人种族优越的“神话”，而后又以这种神话统治人们的精神世界，以此反对其他民族，否定他国文化，其实质就是文化霸权主义，各国人民必须携手共同抵制。信仰是人们精神的慰藉，是灵魂的寄托，在国家独立、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中国，以信仰的不同来歧视中国，排斥中国，是可笑的，也有失西方国家大国风度。

（二）功利主义价值观

资本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即是以个人为中心，这与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实际上，西方社会历史上有过整体主义，其经历了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变迁的历史进程。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表达了有关整体主义的观点：国家是一个高级的整体，个人只有生活在国家里，对国家绝对地服从，才能获得真实的身份，实现自身的价值，进而得到真正的自由。近现代以来各种运动思潮催生了个人主义的种子，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人的地位，提出人是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呼吁由神转向现实的人，关注人的自身价值，突出人的现世幸福，而不再祈祷来世。这也直接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文艺复兴极大的挑战了经院哲学，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开启了西方社会以个人为基准的先河。17、18 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正式提出社会契约论，强调国家要建立在人民的同意、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的个人的作用。启蒙运动实践了社会契约论，丰富并完善了理论成果，论证了权力来源于人民，并且人民具有革命权，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启蒙运动的影响，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现代民主式的法治国家。西方社会经历了几场运动，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个体本位至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个人的幸福感占统治地位，而物质财富的积聚是幸福感最主要的来源。功利主义表现为不顾一切追求私利，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以利益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带动西方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获得领先世界的契机。但是，如今也显现出不少问题：个人在享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的自由，而集体、国家权威却在不断下降；社会凝聚力大大地降低，整个社会松散、瘫痪；诱发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沉迷于物质的追求与享受。因此，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如今显示出的弊端，正好反映了我国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我国的集体价值观强调整体的力量，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在实现整体利益的过程中促成个人利益的达成，整个社会的前进是提倡两者利益的共同发展。“现在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国内外各种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共性、相互碰撞的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党在新阶段对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贡献”⁵，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和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标和要求，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又充分吸收了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思想观念，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当今世界，只有那些能够将各民族自身与其他民族发展的需要与目的协调起来、结合起来的价值观，尤其是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反映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才是合理的、先进的，具有生命力的，从而达到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长久的持续性。

（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

当今世界国际间的阶级斗争和制度交锋始终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冲击没有停止，某些西方国家一直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一直试图通过意识形态输出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被奉为普世价值，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普世价值论”掩盖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意识形态的输出来服务其霸权主义的行径，它以推广和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为手段，以信息网络为媒介，通过文化渗透、政治霸权，为资产阶级获取最大程度的国家利益服务。塞缪尔·亨廷顿坦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⁶

“普世价值”把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观抽象为全人类的普遍性价值观，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利益抽象为全人类的追求，把资本主义某些国家的地方性经验抽象为世界性的原则。当这种抽象普遍性的思想同某些国家的政治霸权主义结合起来之后，就由学术思潮演变为政治思潮，成为霸权国家手中威胁、干涉、阻碍别国发展的工具。“普世价值”把资产阶级价值观永恒化、标准化、绝对化，继而作为真理在全世界推行，这根本就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没有固化的真理，盲目推崇绝对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只会让人类的思想固步自封，失去探索新时期新理论的动力。

西方国家利用我国深化改革的时机，意识形态的相对自由的时期，大肆向中国输出西方自由主义，突出人的自由权利，提出个人如果想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必须将自己与社会脱离。同时，自由主义价值观还引导人们一切从现实的角度看，只关注与自身相关的事物，依据现

实情况、眼前利益做出个人选择。前面已经提到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在西方社会所显露出的弊端，与此同时，它也在腐蚀着中国的一部分人，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毒瘤。需要看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论”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主体性与价值观念的有机统一，二者不是孤立的，我们发扬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同时提倡艰苦奋斗的美德；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完美结合，作为“中国特色”的价值观，需要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成分。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多元性，要求内化于心，实践于行，并且是与时俱进的。而“普世价值论”固化了思想，有悖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将特殊性说成是普遍性，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观”。为此，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思潮，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捍卫本国思想文化、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入的能力，坚定四个自信，有效的阻止错误思潮在我国的蔓延，并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

三、实用主义外交哲学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影响较大的哲学思潮之一。实用主义最先兴起于美国，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并成为指导美国内政外交的隐形线。实用主义包含的新教伦理文化思想，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宗教改革，功用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在其中有深刻的体现。因此，实用主义既包含了英国的文化根源，又囊括了美国的新诠释，如今，实用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深深影响着各国的外交政策。

（一）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的含义、特点

“实用”即“有用”、“有效”，指不拘泥于教条，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具体措施的思想方法，词根含义来源于古希腊，是一种强调行动、实践、生存的哲学。⁷一般意义上讲，实用主义哲学突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创造性，认为哲学和一切实践活动应当从现实条件出发，把采取有效行动作为实践的主要手段，把积极进取作为基本的生活态度，以实践效果作为检验标准，以此希望能最大程度地解决人类在实践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充分实现人的自由。对此，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威廉·詹姆斯有过生动的表述，“有用即真理、真理即工具。”⁸而实用主义外交是指一国在实施其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其根本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一种实用主义或理性主义态度，积极进取、注重实效，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实用主义对美国影响深刻，它鼓励民众开拓荒野、开发边疆、积极进取、富有冒险精神，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美国如今依然信奉的实用主义，由于强烈地服务于本国利益的需要，对外却表现为“干涉主义”，频繁插手他国内政，给国际局势发展制造潜在不稳定因素。

实用主义哲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实用主义是一种重视效用的哲学。这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皮尔士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效用原理”：事物、观念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行动及其产生的效果。⁹后来，詹姆斯、杜威等实用主义思想家又进一步发展了皮尔

士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尤其是杜威提出的工具主义真理观,他强调真理与观念理论的实际效用,并以它们的实际效用作为判断它们是否为真理的标准。反映在外交上,表现为实用主义外交是一种注重现实功效、不拘泥于形式的外交,着重解决实际问题。在某些时候,可以抛开意识形态,只关注于本国的实际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表现的最为明显,新中国成立伊始,美国集结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政权采取打压、封锁、孤立等一系列措施,力求将社会主义中国扼杀。随后,冷战期间,与苏联的对抗中,稍处下风,为了能更好的对抗苏联,美国选择与新中国建交。苏联解体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美国感到了紧迫感,威胁到了其国际霸权地位,于是采取进一步粉碎中国的图谋,在文化领域采取一系列反华政策。这些都体现了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的效用观,把与人有关的事务和实际问题同价值和效用联系起来,探究它们对人的活动是否有利。第二,实用主义是一种重视行动的哲学,实用主义主张哲学应该以研究与人有关的事务和实际问题为中心,使哲学为全人类服务,必须摒弃传统哲学追求所谓永恒的、终极的知识的传统做法,从人的行动出发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人作为行动的主体,人生的一切问题,都与行动有关,它们从人的行动中产生出来,同样也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得到解决。正如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指出的那样:“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行为、有活动。为了维持生命,活动必须连续,并与其环境相适应。”¹⁰反映在外交上,表现为实用主义外交是一种重视行动、实践性较强的外交。西方国家及国际反华势力对华的战略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书面口头上,它渗透于西方国家与中国交往的方方面面,因为有需要,符合战略利益,因此必须行动。且近年来,西方各国文化领域的反华策略越来越多变,层出不穷,形式越来越精巧,更具有迷惑性,这也就反映了实用主义外交是一种重视行动的外交哲学。第三,实用主义认为世界是永恒变化的,没有不变的秩序、原则和绝对的真理。人面对新的问题要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进取;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不能依靠经验处理问题,体现了实用主义具有一定的进取性。曾经成就了早期美国人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但是这也为美国现如今充当“世界警察”留下了隐患。表现在外交上,则体现了实用主义外交具有灵活性,既然世界是不断变化的,真理是不断变化的,规律、原则也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外交政策更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西方国家早期对华思想战略主要是追随美国,根据意识形态来划分阵营,外交手段以经济禁运、政治孤立、军事对抗为主,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程度的加深,西方国家对华战略也有了转变,转而以文化为切入点,更隐秘的方式开展文化入侵。

(二) 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的应用——以美国对华为例

西方国家和国际反华势力对华态度强硬,其中首当其冲的当属美国,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拥有雄厚的综合实力,建国历史虽然只有几百年,但是却后来居上,超越老牌英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西方国家与美国可以说是同根同源,早期移民到北美大陆的大部分民众来自于英国,信奉基督。所以,美国不仅因为其实力在西方国家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同时在文化信仰上对西方也具备强大的号召力。与其说是西方国家和国际反华势力对华的文化入侵,还不如说是美国对华的文化的“和平演变”。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非常特别、很有个性的国家。对待中国,美国一直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中

国市场”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¹¹为了这项目标美国一直在不懈努力。在这过程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际效果至上、注重创造性的实用主义一直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美国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确立了战后的经济霸权地位，在欧洲各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具备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美国领导人在勾勒战后世界蓝图时，曾希冀于将中国纳入美国体系之中，一个亲美、稳定的、统一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代言人，为美国最大程度的利益服务。蒋介石当时为了争取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支持，曾多次发言，将继续追随美国，遵从美国的领导，美国为了扶持蒋介石政府，采取压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甚至在联合国成立过程中，也极力建言坚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后，蒋介石政府大败，美国的愿望彻底破灭，且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政策“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激怒了美国，转而对中国采取强烈的敌视政策。随着中美朝鲜战争的展开，美国由之前的敌视政策转变为全面遏制战略，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封锁、遏制、孤立中国，并在美国领导人之间成为一项既定政策。具体表现为：反对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纠结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频繁插手中国内政，在中国西部地区制造不稳定局势；插手台湾问题，对台运输军事武器，使台湾问题复杂化。美国始终认为“一个日益崛起的、有严密组织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会大大扩展苏联的力量，缩小美国的影响，成为威胁美国称霸全球的阻碍，同时也会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结构安排，即分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图谋。而台湾一直是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强大武器，台湾问题严重影响着中美关系，美国控制台湾就是为了拖缓中国的发展步伐，进而加强美国的战略地位。因此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甚至不惜冒打一场总体战争的严重危险，把台湾及澎湖包括在美国在远东的防御阵地之中”。¹²因此，美国在中国政局上频繁插手台湾问题，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甚至在与中国建交，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政权之后，也与台湾明里暗里有往来，台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美国对华具体政策在各个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根据形势，随时随地采取灵活多变的对华策略。在 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在与苏联争霸处于下风，霸权地位受到挑战之际，美国及时收缩政策，重新审视对华战略，并深刻意识到，一方面，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可以提高美国的安全地位，从而抵御来自苏联的威胁；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再对中国采取孤立、封锁的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大国身份。美国开始与中国接触对话，于 1979 年 1 月中美两国正式¹³建立外交关系，结束了长达 30 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中美关系翻开新的一页。虽然中美已经建交，但是却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矛盾、冲突就此消失，美国在与中国建交后，并没有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交流，却加紧借助中国的力量打压苏联，况且美国国内存在保守思想和反共意识十分强烈的反华势力集团，不断给政府上层施压，要求对华态度强硬。寻找机会在各种问题上附加政治条件，例如最惠国待遇等等，在人权、经贸和军控等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施加压力。1994 年对台关系升级、1995 年允许李登辉访美和 1996 年春的台海危机等，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可以看到美国高层的政策有很大的随意性，实质却并没有什么区别，均立足于为实用主义外交哲学中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 【1】 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 【2】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候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 【3】 黄树东：《制度与繁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 【4】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6页。
- 【5】 李国泉，周向军：《十八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及其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
- 【6】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 【7】 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 【8】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1页。
- 【9】 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 【10】 杜威：《哲学的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78页。
- 【11】 张仲礼、黄仁伟：《从历史的观点看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社会科学》，1996年，第9期。
- 【12】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6-147页。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invasion of Chinese culture

Xu Chen Chen

(School of law,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with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api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various forms of cultural forms are intermingled and exchanged, which facilitates cultural exchanges. However, there are huge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strength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determines the inequality of cultural status. Som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relying on their own economic strength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and then grasping the leading level of cultural export, instill their own ideology and culture into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and socialist countries by means of media, cultural product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or economic sanctions. The aim is to influence the ideology of these countries and thus serve their own development interest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watched China move towards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step by step, moving steadily toward the established goal, and the anti-China forces are increasingly tightening the invasion and infiltration in the cultural field. The reasons behind them are not only the result of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and different ways to enter a modern society. There are not only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values, but also differences in social systems. This make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first western countries to anti-China exclusion as a consistent policy. Only when we know the reasons, can we give the right remedy to the case; only when we understand the attempts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anti-China forces, can we take precautions and push forward the socialist road further.

Keywords: Cultural output, ideology, bourgeois value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ragmatism diplomatic philosophy.

作者简介: 许琛琛, 女, 1994 年, 湖南大学法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